

## 《诗品》考实

逯钦立遗著； 李思清 刘孝严 整理

**编者按：**《诗品考实》是逯钦立教授20世纪40年代后期之旧作，全文26000余字，内容与逯先生1947年发表的《钟嵘〈诗品〉丛考》（《现代学报》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一文相比，虽然文章的整体框架与《丛考》基本相同，但文字超出约7000余字，论述更充实，从版本、序文、成书年代、体例、评诗标准等五方面，对钟嵘《诗品》进行考证和阐述，其中最末一节“论诗起例”（5000余字）为《丛考》所无，逯先生在这一节中将钟嵘的诗学主张、审美理想等置于横向的空间纬度及纵向的时间纬度中进行分析，即使在今天看来，逯先生的分析仍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在逯钦立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特此刊出，以为纪念。

《诗品考实》的手稿原件是毛笔小楷誊抄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蓝格稿纸上，又以红、蓝两色笔做修改，对折装订为35页，现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李思清博士发现并详加校理，本刊编辑部又请逯钦立先生的研究生刘孝严教授与《丛考》详加比对，又承蒙逯钦立先生家人允许在本刊发表。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关键词：**逯钦立；诗品；考实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5-0001-22

传本《诗品》，讹误颇多，而近今注此书者均未能为之校理。故疏证虽勤究非完璧，一也。又是书为专门评诗之祖，虽篇幅略狭，品语较简，然如精心研读，就其各家评语，质之诗人各作，揣摩之论断之，亦足获其精到之论。故先须作一较有统系之文，以明此书之背景，编制，及利弊等事。然后方能与注释之用相得益彰，二也。钦立校辑汉魏六朝诗既竟，欲于古人诗评，有所借镜，以为后日撰作此段诗史之准备，故亟取此书校读之。先用各本详为比对，并蒐引文，广其异同，订正成册。自谓当可与旧本面目约略近是矣。至于欲为此书作一有系统之文，今尚无暇，仅就最基本之问题，分版本叙录、序文指谬、成书年代考、评诗体例说源、评诗标准论要等五目，论之于下。大雅君子，如不以琐屑而赐以指教，则幸甚矣。

### 一、版本叙录

《隋书·经籍志》：《诗评》三卷，钟嵘撰。注，或曰《诗品》。<sup>①</sup>唐宋《艺文志》亦作《诗评》，俱与《梁书》本传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曰：

《诗品》三卷。梁记室参军颍川钟嵘仲伟撰，以古今作者为三品而评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

卷数不异，然已改从《诗品》之名。而王应麟《玉海》五十九引《中兴书目》曰：

《诗评》一卷，自汉以来能诗者一百二十二人，分三品为评。

则仍曰《诗评》，惟卷数又有不同，然此一卷本所载诗人数目与今传各本悉同。并不少于直斋所见之本，似此书自隋迄宋并无佚落，今传之本犹是原有面目。其一卷本不过经后人改编而归并之耳。然据对雨楼丛书本《诗品》跋文，知《吟窗杂录》旧钞本所载《诗品》，比今本溢出多字，如卷下第二行晋徵士戴安道下，有评语数句，第三行晋东阳太守下品人又有“晋谢混”一名，皆为今本所无，证今本已有佚落，一也。又

<sup>①</sup>此句句读，参考逯钦立《钟嵘〈诗品〉丛考》一文。原稿作“隋书经籍志，诗评三卷，钟嵘撰注。或曰诗品……”

**作者简介：**逯钦立（1910—1973），字卓亭，山东巨野人。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专门研习汉魏六朝文学。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广西大学（桂林）、东北师范大学任职。

《吟窗杂录》载作《诗品》，然于品语之上皆冠以“评曰”二字，与今本亦异，知隋唐志录或曰《诗评》或曰《诗品》者，实坐此而有不同。是旧本应有“评曰”二字，而今本无者，乃经后人删除，二也。又韩氏<sup>①</sup>《群书考索》所载《诗品》序文，“口陈标榜”之“口”，此作“具”字，评李陵“文多悽怨者之流”，此于“悽”字下多一“怆”字，文气完足，皆较<sup>②</sup>今本为胜。是今本文字亦多脱误，三也。然则今传各本若不能旁征博引订而正之，固不足遽为据信者矣。检明清以来此书传本约有一十二种：

1.明抄宋本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2.明仿宋本 韶宋楼藏书书目；3.百川丛书本 邵亭知见书目<sup>③</sup>；4.对雨楼丛书本；5.学津讨源本；6.津逮秘书本；7.顾氏文房小说本；8.诗触本；9.龙威秘书本；10.五朝小说本；11.汉魏丛书本；12.历代诗话本。

以上诸本一、二、三本，今未能见，此后九种，对雨楼本、汉魏丛<sup>④</sup>书本、龙威秘书本、诗触本、五朝小说本五种，款式略同，皆评人、评语分行各书，而对雨楼本凡评人多者，且一人独占一行，今姑名为甲类。学津讨源本、津逮秘书本、文房小说本三种，款式略同，皆评人、评语相连直下，不别标评人，今姑名为乙类。历代诗话本，则独以序文三则，总列卷首，与甲、乙两类分列此文者俱异，今姑名为丙类。又《吟窗杂录》本（未见）与韩氏《群书考索》本，可以名曰丁类。此四类之中，丁类最得古本典式，惜乎不能俱见。今者据甲、乙、丙各类之本，及韩氏本校讎一过，知各本互有出入者固不少，而俱属讹误者亦甚多。例如序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韩氏本“味”作“咏”，胜于他本；序文云：“文丽日月，赏究天人”，韩氏本“赏”作“想”，盖误，此似应从各本。评嵇康云，“然语喻清远，良有鑿裁”，《诗触》及韩氏本“鑿”俱作“鑿”，不误。评陶潜云，“世歎其质直”，《对雨楼丛书》“歎”字作“難”，是也。又评阮籍云，“可以陶性灵，发幽思”，韩本“灵”作“情”；评任昉云，“昉深恨之”，《诗触》本及《龙威秘书》本“恨”俱作“悵”。此则字可两存。凡此皆各本互异，而略能订正者也。至于各本并误者，如序文“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应改入“曾无品第”句下。评谢灵运生未“旬日而谢玄卒”，“玄”应作“兖”（灵运父）。又如评任昉“若铨事理，拓体渊雅”，“若”字应为“善”字之讹。评魏文帝“则新奇百余篇”云云，评何长瑜“乃不称其才，亦为鲜举矣”云云，则皆有脱文之处。凡此则只因仍各本，姑存阙疑。又如评沈约，“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遑，江淹才尽”云云，应据《南史·钟嵘传》于“明”字下添“中”字，“附”字下削“之”字，此则又须广征他书引文，为之订正者也。

## 二、序文指谬

《历代诗话》本《诗品》不从旧本，而别以序文三则，总冠全书之首，古直《钟记室诗品笺》用之，并为之说曰：

夫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云云，略同凡例，昔曹、刘殆文章之圣云云，专议声律，末后所举陈思又不属于下品，其不能冠诸中品、下品以为序，常知与知乃诸家刻本皆承讹袭谬，不能致辨，是可怪也。今依《诗话》本合为一篇，冠于全书之首，依本传增“序”字，以复其旧焉。

钦立案，何文焕合此三序，总冠书首，用心当同，古君仅捷足先之，非所据之本异也。考各本以三序冠诸三品，其为错误诚如古说，然合三文并为一序如诗话本者，亦未可必其为原序之旧，请试论之。今本中品之首序文（《群书考索》本有“序曰”二字，其他各本无，下同）云：

一品之中，略依世代为先后，（中略），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章清浊，掎摭利病，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又下品之首序文云：

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二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

①“韩氏”，似应作“章氏”，《群书考索》系宋章如愚刊刻。文中《群书考索》多处出现，其前均题“韩氏”、“韩本”。

②“较”，原稿作“校”。

③“邵”，原稿作“郢”；“书目”作“书本”。

④“丛”，原稿作“从”。

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略）陈思赠弟，仲宣《七哀》<sup>①</sup>，（略）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

如依何氏将上引二文以次并入上品之序，合为一篇，则“文采之邓林”一段，是否可为结语，姑可不论，而中品序文“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云云，乃书序乞言之恒例，殊须明其应在之位置。考古人书序，率以乞言附之结尾，此在魏晋六朝已为习例。如晋谢敷《安般守意经序》（《出三藏记集》六），释道安《道行经序》（同上，卷七），支道林《大小品对比要钞序》，支敏度《合维摩经序》（同上，卷八），释道标《舍利佛阿毘昙序》，释慧远《阿毘昙心序》，及《大智论序》，道挺《毘婆沙经序》，譙镜法师《后出杂心序》（同上，卷十），僧佑《出三藏记集序》，又《弘明集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等，均为以乞言结尾者。今略举一二于后，以见其一般。

慧远《大智论钞序》结尾云：

虽不足增辉圣典，庶无大谬，如其未允，请俟来哲。

释藏迹《九僧卫十任经合注序》：

庶后来明哲，有以引而补焉。

又譙镜法师《后出杂心序》结尾云：

今谨率所闻以示后生，至于折中，以俟来哲。

又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结尾云：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据上所引六朝书序，以乞言结尾之例，可以概见。则《诗品》此文三则，如应并为一篇，必先缀下品之序于上品序下，而以中品之序殿之，以连成合乎当时习惯之序文。而决不得遽依上中下三文原次草率为之也。且诚如吾人合并之法，即以上下中三文而合并之，则《诗品》此一总序，即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之铨事<sup>②</sup>行文，均有同条共贯之妙，兹为表比较于左：<sup>③</sup>

	诗品总序（依吾人合并法）	宋书谢灵运传论
先论起源	自“气之动物”至“非衰周之倡也”一段	自“民秉天地之灵”至“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一段
次论流别	自“王杨枚马”至“质本无文” 自“降及建安”至“文词之命也”共两段	自“周室既衰”至“久无嗣响” 自“至于建安”至 <sup>④</sup> “垂范后昆”共两段
次论声律	自“昔曹、刘殆文章之圣”至“閭里已具”一段	自“五色相宣八音协畅”至“妙达此旨始可言文”一段
次选佳篇	自“陈思赠弟”至“文彩之邓林”	自“至于先士茂制”至“非傍诗史”
次述己见并附乞言	自“夫属辞比事”至“请寄知者耳”	自“以音律调韵”至“请俟来哲”

读者取钟序沈论，准此表参较观之，自信吾言之不诬。夫沈论兼及诗文，钟序只评五言，而行文之相同，有若此者。则《诗品》此三则之文，如欲连缀成文，固舍此而莫属。盖钟嵘作《诗品》时，沈约《宋书》已成驳之，亦或无形中受沈文之影响，而行文遂有此雷同乎？然则何文焕拼凑之法，固不得据以为准矣。

①原稿脱“七”字。

②“铨事”，原稿作“论事”。

③表格原为竖排，今改横排。

④原稿脱“至”字。

虽然此文依吾人之法而合并之，固可合乎当时书序之文体，顾仍有齟齬不安者三事：考《梁书》本传载钟嵘《诗品》序文，上起“气<sup>①</sup>之动物”，下至“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与今《诗品》序文全合，一无删节，似姚氏撰《梁书》时所见序文，亦仅此篇。而今本中、下品两文并非序文之一部，且“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一句，已为篇末之结语。若再缀他文，即有续貂之弊，此其一。今本上、中、下三序，如原为一序，而后人逞臆析而为三，亦决不至将“昔曹、刘殆文章之圣”云云，冠于下品之上。因此文专论声律，又历举大家名篇，无涉乎下品诗人也，此其二。下品之文自“昔曹、刘殆文章之圣”，至“闾里已具”为一段，自“陈思赠弟”至“文彩之邓林”又为一段，设此文“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之下，即接以“陈思赠弟，仲宣《七哀》”云云，上下文义，实不连属，此亦必有其不相连属之故，吾人与其逞臆合此三文，不如研其所以离析之故，此其三。钦立尝就此三文所在之位置，觐其各与前后文字之关系，因稽之史传记载之言，参之《诗品》传本改编之事，因进而揣其窜乱之原因，始悟今本《诗品》之分三序冠三品者虽为有误，而其误实别有在，初非后人有意分列者也。

窃以《诗品》仅上品前端之文为其原序（《梁书》本传引之），其中品前端之文，则原为上品以后之附语，以示上品之凡例，与此凡例所以订定之故，举一反三，即以明中、下两品亦复同之。下品前端之文，则自“昔曹、刘殆文章之圣”至“闾里已具”一段，原为中品。沈约以后之附语，专论声律以诋沈约声病之说，而自“陈思赠弟”至“文彩之邓林”一段，又原在下品以后，为全书之总附语，列举诗人名篇以为后人学诗之标准也。请申论之。考《南史·钟嵘传》云：

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

寻约诗列为中品，未为排抑，（四库提要语），又“词密于范”，原属为褒辞，而“意浅于江”一句，同乎评范云“浅于江淹”之语，亦并非过贬。《南史》谓嵘以此报怨之语，殊不合理。且《梁书》本传无此报怨一条，李延寿作《南史》始为载之，其为后出之事，又可灼见。考钟嵘作《瑞室颂》，以典丽著称，又为简文任记室之职（详后），而刘绘、谢朓并皆与商略诗章，辩论利病，则钟嵘早以文学见重于世，必不至有“求誉于约”之事。则《南史》引钟评沈之语，而谓其以此报怨，可谓无的放矢者矣。顾此报怨之说，虽近诬，而后人所以发生此说，亦事出有因。寻《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云云，深诋声病之论，一则谓“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再则谓“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三则谓“千百年中，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贤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其为攻击沈约，固显然可见，然中品诗人，沈约居末，则此深诋声病之论，其必因原附沈约评语之后，遂有此后人报怨之论乎？盖钟嵘实就沈约评后借机发为此论，以见其反对永明文体之主张，文中虽以倡声病者，委之王（融）、谢（朓）、沈约三家，而不专斥休文，后人观其批驳之文，附于约后，而因妄意故有此报怨之说也。据此则“昔曹、刘殆文章之圣”云云一段，实中品末尾之附语，而非下品之序，无疑矣。

此中品末尾之附语，所以窜为下品之序，及上品之附语所以窜为中品之序，则因此书传刻由三卷并为一卷，复由一卷分为三卷之变革中而偶然窜乱之者。案《中兴书目》及《宋史·艺文志》著录此书，俱作一卷，上与隋唐录下与陈振孙《解题》作三卷者均异，可证此书两宋间仅有三卷合并之一卷本，至陈振孙所见三卷本，则又后人据旧志新厘之三卷本，而古传之三卷本，盖唐宋间即已无传矣。三卷本合为一卷，上品（卷一）之附语遂与中品（卷二）之诗评连而不分，中品（卷二）之附语亦与下品（卷三）之诗评连而不分，以故此二附语之究为附语抑为序文，南宋人已莫能知。逮至复分三卷时，编者遂误将此二附语分别冠之中品、下品之首，而并将书尾之总附（即“陈思赠弟”至“文彩之邓林”一段）亦提入下品序文，汇为一篇。今日所见以三序冠三品之本所以谬误颠倒，不可究诘之故，盖以此<sup>②</sup>矣。

据上所述，此书中、下两品前端之文，不得依何文焕本总为一序，亦不得依吾人合并之法总为一篇。此书之误，不在其各文之分离，而在其各文之合并。若冒然合而为一，较之宋人以跋为序者，其为窜乱仍

① “气”，原稿作“心”。

② “此”，原稿作“比”，笔误。

无异也。今依《中兴书目》仍将此书订为一卷，书中各文除“陈思赠弟”云云一段，分出置之书末以外，余则悉仍其旧，而就其孰为序文，孰为跋语者，辨之如右。

### 三、成书年代考

叶长青君《诗品集释》有导言若干则弁诸书首，中谓钟嵘卒于承圣元年云，又论钟氏作《诗品》动机及著书之年代云：

至于著书年月，史无明文，惟《梁书》本传载，“西中郎晋安王记室，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为诗评，顷之卒官。”案《南史·敬帝本纪》，承圣元年封晋安郡王（即晋安王），二年出为荆州刺史。则记室之死实方智迁王之年，而《诗品》一书，又其绝笔之作，距今盖千三百七十七年云。

钦立案，叶君此说失之不考，《诗品》之作与钟嵘之卒，实俱不在承圣中也。检《梁书》四十九《钟嵘传》云：

迁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时居士何胤筑室若邪山，山发洪水，漂拔<sup>①</sup>树石，此室独存。元简命嵘作《瑞室颂》，辞甚典丽。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其序曰，（略）顷之卒官。

此钟嵘入梁以后出处之大凡也。考此西中郎<sup>②</sup>晋安王者，乃晋安王纲（即简文帝），而非晋安郡王方智（敬帝）。《梁书》四<sup>③</sup>《简文帝纪》云：

天监五年封晋安王，（略），十七年，徵为西中郎将，领石头戍军。寻复为宣惠将军，丹阳尹，加侍中。普通元年<sup>④</sup>，出为使持节<sup>⑤</sup>都督益、宁、雍、梁、南北秦、沙七<sup>⑥</sup>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未拜，改为云麾将军，南徐州刺史。

兼证钟传“西中郎”，指晋安王纲，其时又在天监十八年之前，因敬帝方智以承圣元年封晋安郡王，二年出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此“平南将军”与“西中郎将”互异，并不能强合之而谓钟嵘为方智记室也。又案《梁书·武帝纪》云：

天监十七年年二月乙卯<sup>⑦</sup>，以领石头戍事南康王绩，为南兖州刺史。

比照《简文帝纪》，知简文为西中郎领石头戍事，实在十七年二月以后。又简文寻复为宣惠将军丹阳尹，则西中郎将一职，又不能延至十七年以后。据此钟嵘若卒于晋安王记室，至迟亦不在十八年之后，而下距承圣二年尚有三十三年之久，叶君之说失之远矣。

钟氏卒年既定，兹更论其撰著《诗品》之年代。据《梁书》本传，“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云云，似天监十七年二月以后，钟嵘为晋安王记室时，方从事于撰作，下距卒时为日甚暂。叶君谓此书为其绝笔，似可据信。然细案之，实亦不然。检《诗品》有云：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论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

此《诗品》选人之大凡也。案《诗品》所评梁代之士，仅有江淹、范云、丘迟、任昉、沈约、范缜、虞羲、江洪、鲍行卿、孙察等十人。其他著名诗家如柳惔（始为吟咏，王融书壁嗟赏，见《梁书·丘迟传》<sup>⑧</sup>），王筠（呈诗沈约，休文叹服推能，见《梁书·王筠传》），及何逊，刘孝绰（见重于世，世称“何刘”。见《梁书》何、刘两传，又《颜氏家训·文章篇》），张率，王僧孺（梁武帝称率为“才子”，任昉誉王为“兰芷”，

①“拔”，原稿作“跋”。

②“西中郎”，原稿作“中西郎”。

③“四”，原稿作“二”。

④“普通元年”，原稿作“普通之年”，后又将“之”字改作“三”。

⑤“使持节”，原稿作“持使节”。

⑥原稿脱“七”字。

⑦原稿如此，后一“年”字疑衍。

⑧“丘迟传”似应为“柳惔传”。“琅邪王元长见而嗟赏，因书斋壁”云云，见《梁书·柳惔传》。

见《梁书》张率传、王僧孺传）等，并皆以文藻流声梁初。今钟嵘此书各无所及，足证《诗品》成书，必在此数子谢世之前。检《梁书》各传，王僧孺卒于普通三年，张率卒于大同元年，刘孝绰卒于大同五年，王筠卒于大同三年：上距天监，为时皆久，其不入《诗品》，自属当然。又检《梁书》二十一柳惔传云：

天监十六年卒，时年五十三，赠侍中，中护将军。

又《何逊传》云：

除仁威庐陵王记室，复随府江州，未几卒。

而《梁书》三十三《庐陵威王绩》云：<sup>①</sup>

天监八年封庐陵郡王（略）。十六年为江州诸军事，云麾将军，江州刺史（武帝纪同）。

是何逊亦卒于天监十六年顷。然则由柳、何二家之不入《诗品》，可证《诗品》之成书必在十六年以前。其非钟嵘绝笔，可瞭然矣。

又寻《诗品》所评梁代文士江淹等十人，范缜以下五人卒年无考，范云天监二年卒，江淹天监四年卒，丘迟、任昉俱卒于天监七年，沈约卒于天监十二年闰三月。又知此书必撰于天监十二年以后，十二年后而十六年以前，其时简文帝未为西中郎将，则此书不作于为晋王记室之时，又可知矣。寻衡阳王元简，天监十三年入为给事黄门郎，钟嵘此时仍为元简僚佐，抑赋闲家居，作成此专门评诗之书，则以文献不足未可骤定焉。又案今传顾氏《文房小说》本、及韩氏《群书考索》本《诗品》，皆署“梁征远记室参军钟嵘”。案“征远记室”一职不见本传，而此书有之，当非后人妄加。使果隋唐旧本亦有此署，则见钟嵘且卒于征远记室，而不卒于西中郎晋安王记室。惟此征远将军究系何人，暂亦未能得之，存疑可耳。兹并就有关《诗品》成书年代，及钟嵘生平者，据《梁书》为一简表如左，读书论世君子而以考焉。

天监二年	503	范云卒
三年	504	临川惠王宏进号中军将军 钟嵘迁中军临川王行参军
四年	505	衡阳王元简除中书郎迁会稽太守 钟嵘为其宁朔记室参军 江淹卒
七年	508	丘迟任昉卒
十三年	514	沈约卒
十三年至十五年	514-516 515	钟嵘撰《诗品》成 十四年，昭明太子年十五，始加元服
十六年	517	柳惔何逊卒
十七年	518	晋王纲为西中郎将领石城戍事 钟嵘为其记室参军
十八年	519	钟嵘盖卒于是年
普通元年	520	吴均卒
二年	521	周兴嗣刘孝标卒
三年	522	王僧孺卒
七年	526	陆倕卒
大通元年（共二年）	527	张率卒
中大通元年（共六年）	529	萧琛卒
三年	531	昭明太子卒，年三十一

①此处卷数及人名不确。“庐陵威王绩”，“绩”应作“续”，萧续转载《梁书》二十九。萧续为南康简王。

大同元年	535	刘遵卒
五年	539	刘孝绰卒
七年（共十年）	541	刘儒卒
太清三年 其后为元帝承圣年号	550	王筠卒

#### 四、评诗体例指原

钟嵘评诗，分品别流，乃兼袭“九品论人”及“《七略》裁士”两法，创为此书之体例，故序曰：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

此汇合两类品科之法以为经纬，施之于一体文学而为评论，无论其类别精粗，升降当否，此新立之问架，实一大杰作也。然此书体制之依傍，不止此也。第一，就分品者言之，《诗品》此一问架，乃袭取当时棋书绘画之品评体例而成。请先言南朝之品棋。《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云：

善属文，善奕，棋品第二。

又四十六《萧惠基传》云：

当时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吴郡褚思庄，会稽夏赤松，并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庄思迟，巧于斗棋。宋文帝世，羊玄保为会稽太守，帝遣思庄入东与玄保戏，因制局图于帝前覆之，太祖使思庄与王抗交赌，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略）永明中敕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

又《隋书·经籍志》载范汪等注《棋九品序》一卷，梁武帝撰《围棋品》一卷，陆云撰《棋品序》一卷，（案陆云当是陆云公，梁人。）以上见齐、梁品棋之盛，及九品为评之一般。

次述品书。《南齐书》三十三《王僧虔传》云：

太祖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僧虔曰：“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上大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矣。”（“僧虔曰”以下原作“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此据《太平御览》七百四十七引文。）

又《法书要录》载庾肩吾《书品论》，其格式如下：

1、序：玄静先生曰：予遍求邃古遯访<sup>①</sup>厥初。（略）辄删善草隶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称圣居首，法高以追骏处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类相附，大等而三，复为略论，总名《书品》。

2、评：张芝 钟繇 王羲之

右三人上之上

论曰：（略，又其下八品皆略）

3、跋：今以九例该此众贤，犹如玄圃积玉，炎州聚桂。其中实相推谢，故有兹多品。然终能振此鳞翼，俱上龙门。俛后之学者，当更点额云尔。（卷末下之下“论曰”以后附有此跋）

此外如宋羊欣《能书人名》、王僧虔《文字志》、王僧虔《论书》等，皆专门品书之作，兹不备举。以上又见齐、梁品书之盛，及其品书体例之一般。

复次品画。《南齐书》四十八《刘绘传》云：

荥阳毛惠远善画马<sup>②</sup>，瑱（绘弟）善画<sup>③</sup>妇人，世并为第一。

又《历代名画记》载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共分六品，其式如次：

①原稿脱“访”字，据《法书要录》补。

②原稿句首“荥阳”前有“又”字，句尾脱“马”字。据《南齐书》改。

③“画”，原稿笔误为“会”。

1、序

2、第一品（评人及评语略）

3、第二品 袁蒨<sup>①</sup> 比方陆氏，最为高逸，象人之妙，亚美前贤。但志守师法，更无新意，然和璧微玷，岂贬十城之价也。

4、第三品 江僧宝 斟酌远陆，亲渐朱蓝，用笔骨梗，甚有师法，像人之外，非其所长。

5、第四品 王微 史道硕 并师荀卫，各体善能，然王得其细，史传其真，细而论之，景玄为劣。

6、第五品（略）

7、第六品（略）

以上又见齐、梁品画之风，及其体例。总观上述齐、梁间棋书绘画之科品，其以九品之法，以科优劣，不特久已成风，亦复久已成例。钟嵘生当此时，渐染此风，而习惯此品评之体例。其作《诗品》，正应假此旧格，发其新议也。且钟嵘之袭用此书画品例，抑复出于有心，此可于序文见之，曰：

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

此“殆均博弈”之言，实钟嵘取法棋书品例之注脚，特未明言之，故不为后人所审知。又据《南齐书·刘绘传》，绘曾为撰著<sup>②</sup>《能书人名》一篇。案宋羊欣已著<sup>③</sup>《古来能书人名》，绘之此作，必不同之，而《诗品》亦称绘“欲为诗品、口陈标榜”云云。疑绘之《能书人名》，即以分品为评，则钟嵘此书，殆未免受其暗示乎？

以钟嵘取效书画品例，故其论诗，亦间仿书品、画品之语，如《诗品》评宋豫章太守谢瞻，宋仆射谢混，宋太尉袁淑，宋征君王微，宋征虏将军王僧达曰：

其源出于张华。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课其实录，则豫章、仆射，宜分庭抗礼。征君、太尉，可托乘后车。征虏卓卓，殆欲度骅骝前。

此评文末句，即王僧虔论书之语，《法书要录》引其言曰：

中书令王珣，笔力过于子敬书，旧品云：有四疋素，自朝操笔，至暮便竟，首尾如一，<sup>④</sup>又无误字。子敬戏云：弟书如骑驃騊常欲度骅骝前。

又评谢朓云：

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

而王僧虔《论书》，亦云：

谢灵运乃不伦，遇其合时，亦得入流。

则“不伦”之评，亦采自书品。又《诗品》往往兼评数人，而较其优劣，如评晋清河太守陆云，晋侍中石崇，晋襄城太守曹摅，晋朗陵公何劭曰：

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陈思之匹白马。于其哲昆，故称二陆。季伦、颜远，并有英篇。笃而论之，朗陵为最。

此与谢赫《画品》兼评王微、史道硕，而有“细而论之，景玄为劣”之言者，又为同一笔法。然则《诗品》分品评人之一法，固自书画等品例得之，其非直袭“九品论人”者明矣。

第二，就其别流者言之，《诗品》此一体例，乃应乎当时文士摹拟前贤诗体之习，参之书画品例师承家数之说，而综合制成之，亦非直袭“《七略》裁士”之法也。请申论之。

摹拟前人诗体之习，昉于拟作乐府，（如鲍照《代陈思王京洛篇》，《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袁淑《效子建白马篇》者是。）畅于拟人某题，（如鲍照《拟阮公夜中不能寐》；刘孝绰《学潘安仁河阳诗》，又《侍

①“蒨”，原稿作“倩”。

②“著”，原稿作“箸”。

③“著”，原稿作“箸”。

④原稿为“旧品有四疋素，月朝操笔三暮便就，竟首尾如一”。“旧品”后脱“云”字，“月”、“三”各为“自”、“至”之误，且衍一“就”字。据《法书要录》校改。



宴同刘公干应令》者是。)而大成于摹仿前人之诗体,(如鲍照《学公干体》、《学陶彭泽体》;王素《学阮步兵体》;江淹《杂体三十首》及《学魏文帝》;何子朗《学谢体》;鲍几《拟吴均体》,皆是。)其结果致使齐、梁两代诗人文士,遂皆专仿一家,鄙薄他体,以故古人诗各有体,以及源流家数之说,得大炽于世。此《诗品》所谓“朱紫相夺,喧议竞起”者也。《南齐书》三十五《武陵昭王晔传》云:

晔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上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

又《梁书》四十三《庾肩吾传》云:

时太子与湘东王书曰: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略)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易慕。(略)诗既若此,笔又如之。(略)甚矣哉,文之横流,以至于此。

又《梁书》四十四《伏挺传》云:

为五言诗,善效康乐体。父友人乐安任昉,深相叹异,常曰:此子日下无双。(伏诗今存《行舟值早雾》一首,体似谢诗,中有句云:“空水共澄鲜”。则直袭谢《登江山孤屿》诗。)

此皆当时专学康乐诗体者。又《诗品》云:

余从祖正员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唯此诸人,传颜陆体,固执不同,如颜诸暨,最荷家声。

又云:

师鲍照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案虞炎《有所思》云:黄鸟度青枝,仿谢朓《侍宴光华殿奉敕为皇太子作》“叶依黄鸟”一句作成。)

此又当时专学颜延之鲍谢诗体者。在此各竞师承,标立门户之风气中,而成一诗派创一新体者,亦复应运而生。《南齐书》五十二《陆厥传》云: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sup>①</sup>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

又《梁书》四十三《庾肩吾传》亦曰:

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踰于往时。

此与《诗品》“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之说,可相发明,俱见永明一体之徒能助长摹拟之风。又《梁书》三十《徐摛传》云:

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

又《梁书》二《简文帝纪》云:

伤于浮艳,当时号曰“宫体”。

此皆别构新体之例。案此别创一体,表面上似与专摹旧体者大异,而其使齐梁文士拘挛于流派,而终归摹拟者则一也。是以江淹《杂体诗序》曰:

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则忌辛,好丹则非素。(略)乃至公干、仲宣之论,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评,人立矫抗;况复殊于此者乎?

而《南齐书·文学传》所谓“朱蓝共妍,不相祖述”,及《诗品》所谓“朱紫相夺,各各为容”者,亦正为此专摹一体,非笑他人者而发,与文通之言略同也。然则于此摹拟成风各立门户之习俗中,而撰一品评诗篇之书,如钟嵘《诗品》者,其必各定其源,而别其流,然后论其或优或劣,固为一当然之事矣。至于书

<sup>①</sup> “汝南”,原稿作“河南”。

画评品，皆重师承，此例至伙，不必枚举。而《诗品》别流之法，亦当与之不无关系也。

总之，《诗品》分品别流之体例，与当时艺术之品藻习惯，及诗文之摹拟风气，俱有因袭之痕迹，而非汇合九品、《七略》之法，直创一新异之闲架者，固燎然甚明。盖一书之体例，每有一使其必达此点之背景，决无架空创成之理，钟嵘此作，实亦不能例外。爰因钟书之体例，以略见齐梁之文风焉。

## 五、评诗标准论要

此书钩深致远，为后世诗话之开山，其为重要，自不待言。然检各诗话家取则者有之，诋诃者亦有之，则此书之得失当否，乃有不可不深辨之者。兹就其评诗标准，分为三事，论之于此。

### （一）上中下三品诗人之厘定

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下曰：

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善之，今始知其踳谬不少。嵘以三品铨叙作者，自譬诸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乃以刘桢与陈思并称，以为文章之圣。夫桢之视植，岂但斥鷃之与鲲鹏邪？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桢与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干、谢庄、王融、帛道猷、汤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颠错，黑白淆讹，千秋定论，谓之何哉！

钦立案：时代悬异，论文标准，往往因之而殊，遽以后代之见，诛责古人，此不可者，一也；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遗篇旧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残文，定当日全集之优劣，二也；（此用四库提要语。）一书之成，有所创，而默受直袭，亦有所因，若不明所因创，而即加评驳，则于作者不免责之过苛，亦不免推之过重，三也。而渔洋不稽史实，竟诬钟嵘颠错位置，混淆黑白，岂有不乖乎述作之道乎？然渔洋此论，最为反钟之代表，兹不得不据其驳议而重论之。

寻钟嵘三品诗人之铨叙，皆宗古准今，为之厘定，鲜有臆断之处；然此非后世好为臆断者所能知也。兹就刘桢、王粲、陆机、潘岳、谢灵运、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等十人，而取钟氏以前之各家评论，以证钟嵘品第之多引成说，而最为允当者。《宋书》六十七《谢灵运传》云：

（上略）子建、仲宣，以气为体，并能标能擅美，独映当时。（略）降及元康，潘陆特秀，（略）爰及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能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而于他人无此称评。又《文心雕龙·明诗篇》曰：

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

又江淹《杂体诗序》云：

乃至公干、仲宣之论，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评，人立矫抗，况复殊于此者乎？

证此刘、王、陆、潘四人，皆当时仿效之典型人物。又《文苑英华》七百四十二裴子野《雕虫论》曰：

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爰及江左，称为“颜谢”。

又《梁书》四十三《庾肩吾传》载梁太子纲《与湘东王书》<sup>①</sup>曰：

远则杨、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

以为皆诗人之魁杰。又《艺文类聚》五十八引梁简文帝《答新渝侯和诗》书曰：

垂示三首，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跨蹶曹、左，含超潘、陆。

俱见齐、梁文士凡称举古今诗家，无不以曹、刘、王、潘、陆、颜、谢为其冠冕，讽高历赏，久成定论，（晋、宋时推赞此数子者，不必一一枚举。）则钟嵘以刘公<sup>②</sup>干、王粲、潘岳、陆机等置之上品，而曰“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又曰：“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二之才”云云，盖无不准乎公论，而为定评。王渔洋乃谓刘桢、王

<sup>①</sup>原稿作“与湘东书”，“王”字脱。

<sup>②</sup>原稿脱“公”字。

粲，不宜居上品，陆机、潘岳，应列中等，宁非不考之甚乎？此其一。魏文帝《与吴质书》云：

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

案《诗品》所论，“止乎五言”，则以公干列上品，而谓“曹、刘殆文章之圣”者，皆就其五言诗论述之也。王渔洋乃诋公干，不如伟长（徐干），其为论诗耶，抑论文耶？吾知王氏之未有当也。此其二。又《南齐书》五十二《文学传》云：

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

而《诗品·序》亦云：

爰及江表，微波尚存，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

两相对照，俱见刘琨、郭璞，皆过渡期间之诗人，虽皆能高谢玄风，独振异响，然得名未盛，无由动俗。此虽关时运，驰骋无由，而《诗品》铨评，亦难乎不准其成就为言。则居之中品，诂为贬抑乎？又陶渊明为诗，不随时流，世既难其质直（《诗品》），人亦嫌其多酒（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虽钟嵘为评，曲尽褒誉，昭明知文，独爱陶作，（见《颜氏家训·文章篇》）。又案钟嵘评陶云：“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云云，推崇可谓备至。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云：“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尚想其德”与《诗品》“想其人德”一语同；又钟举陶潜二诗，昭明皆载之《文选》，案《诗品》作于天监十二年至十六年间，其时昭明尚幼，（十四岁至十七岁），其编《文选》，及为陶集序，皆当在《诗品》以后，则昭明所以爱陶，正受钟评影响，钟可谓陶之知音矣。）<sup>①</sup>然齐、梁文士如沈约者，乃谓“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遁丽之辞无闻”，而钟嵘亦不得不有“晋、宋之间，殆无诗咏”之言，知后人所重之陶诗，在当时仅为别派，而非正宗，钟氏以私好置之中品，则可，固不得置之上品矣。（《太平御览》五百八十六文部，“钟嵘《诗评》曰：古诗、李陵、班婕妤<sup>②</sup>、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皆上品”云云。案宋人书目，皆称《诗评》“上品十一人”，不云“十二人”，今《御览》作“十二人”，而以陶潜夹注十一人之下，特好事者为之。如陶在上品，论时代不得在谢氏以下。）至于鲍照，虽美文动俗，远在大明（《诗品》），羲皇上人，艳称梁代，然既以险俗，颇乖清雅（《诗品》），而炫目淫心，亦伤浮靡（《南齐书·文学传论》），得失参半，事同驳圣，故以列居中品，最为允当。次则《金楼子》有谢朓“贫小”之评，齐、梁人有江淹“才尽”之说，亦断无谬列上品，唐突曹、刘之理。渔洋乃谓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等，必归上品，亦又其私人之见，无与于古人矣。此其三。然则钟嵘于此中品诸贤之排定，固亦准乎故评，酌之时论，而审慎为之者。上、中二品既如此，则下品次第之斟酌尽情，亦略可知矣。以上略就诗家数人，而举其所得之历代称评，或当世毁誉，以明钟嵘论断之谨严允正者有如此。若夫详蒐唐宋以来诗话家反钟之论，归纳分析，进而辨章六朝诗家之正宗别派，并参以各家诗篇，体验历代诗评，以明古今来诗学升沉大势，则须有专文论之，此不及焉。

## （二）诗源之标准

《诗品》别流之体例，乃应乎当时摹拟诗体之习，准乎书画品评之例构成此一间架，而非直接采自《七略》者，已于上节加以阐述矣。然某源出于某之标准，究何所在，及此标准之得失当否，有无可议，又须于此加以讨论。案此书上、中、下三品诗人，百二十余人，其中别流者，三十五家。

### 上品：

1.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2.李陵诗，其源出于楚辞；3.班姬诗，其源出于李陵；4.陈思王诗，其源出于国风；5.刘桢诗，其源出于古诗；6.王粲诗，其源出于李陵；7.阮籍诗，其源出于小雅；8.陆机诗，其源出于陈思；9.潘岳诗，其源出于仲宣；10.张协诗，其源出于王粲；11.左思诗，其源出于公干；12.谢灵运诗，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

<sup>①</sup>细考文意，自“见《颜氏家训·文章篇》”起至此，均应为按语。此处右括号“）”原稿缺，今据文意补于此。

<sup>②</sup>“班”，原稿作“斑”。

### 中品：

13.魏文帝诗，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14.嵇康诗，颇似魏文帝；15.张华诗，其源出于王粲；16.应璩诗，祖袭魏文；17.刘琨诗，其源出于王粲；18.郭璞诗，宪章潘岳；19.陶潜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20.颜延之诗，其源出于陆机；21.谢瞻、谢混、袁淑、王微、王僧达，其源出于张华；22.鲍照诗，其源出于二张（张协张华）；23.谢朓诗，其源出于谢混；24.沈约诗，宪章鲍明远；

### 下品：

25.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钟宪、颜测、顾则心，并祖袭颜延之

据上列二十五组，可注意者，分言之计有三事：诗人百二十余家，钟嵘所能别其流者，仅三十五家，知钟氏并非酷守一例，一也；上品诗人，悉明其源，中品诗人，三十九名，别流者仅十六家，为数不至其半，而下品诗人，则又仅一组七人，明其师承，知钟氏于吟咏一道，最重祖述，二也；齐梁文士，宪章谢体者极众，而此不著其一人，盖以谢体“富艳难踪，巧不可阶”（简文帝语），学之者无一人肖之，亦无一人以之成家，故不及之，三也。就此三事而综合之，则又似仅一端，即钟嵘别流之法，乃视某诗之确肖某家，而用以为准则者，是也。然而尚不止此，钟嵘于品评沈约条下曰：

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

据此，知钟嵘别流之法，实于“观其文体，察其余论”者，兼而有之。夫甲乙诗体，可以玄同，使乙无师甲之论，未可遽断乙之必出于甲；又摹拟他人，未必即肖，画虎类狗，此类颇多，则乙之于甲，虽知确为私淑，而诗体不及，（如云学鲍照不及“日中市朝满”），亦未得遽定乙之承甲。然则以上举二语，以为别流之法，可谓竭其能事矣。惟钟嵘于书中，一则曰嵇康“颇似魏文”，再则曰灵运“杂有景阳之体”，推其所言，究以“观其文体”者为主也。且吾人时去六朝邈逾千祀，其作者余论，戛乎难得。则欲论钟嵘此法之得失当否，亦厥惟稽稽遗文，求之文体，略见其一斑焉。又《诗品》别流者，三十余家，不可备举，钟嵘于陶潜首为推奖。兹故以其评陶之条摘出论之，其余类推可也。《诗品》中云：

宋徵士陶潜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难其质直，至“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此陶潜出于应璩之说，后人指其谬者，为论甚多，今概不举。唯毛晋跋《诗品》云：

至若靖节先生诗，自写其胸中之妙，不屑屑于比拟，乃谓其出于应璩，岂以靖节《述酒》诸篇，悼国伤时，仿佛《百一诗》，讪刺在位遗意耶？

此言差为有见，然亦未足尽之。寻钟嵘所以定陶潜出于应璩，若以其施诸二家之评语观之，盖能归为三点，而此三点，以吾人观之，实应、陶二家诗章所共有之特色也。今分述于此：

一曰华靡。《诗品》应璩条下云：“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咏焉。”又陶潜条下云：“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可证“华靡”二字，为二家诗章之所同有。夫“华靡”二字，兼言词采音节之美，论词采则曰“华”，论音节则曰“靡”，“华”者在目，“靡”者入耳。此与陆机《文赋》所谓“诗缘情绮靡”，而以“绮靡”二字，兼及篇章之声色者，论法相同。然应、陶诗，如钟嵘所举者，果可称为“华靡”乎？今请列出陶潜二诗，而择所见应诗残篇之略近陶诗者，为之作一比较：

#### 陶诗：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

#### 应诗<sup>①</sup>：

酌彼春酒，上得供养亲老，下得温饱妻子。（《北堂书钞》百四十八引应璩诗，案此诗首句当有脱文）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长短有常会，迟速不得辞。斗酒多为乐，无为待来兹，室广致凝

① “应诗”二字，原稿无。

宙，不乐复何如。（本集《读山海经》第一首，又见《文选》）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本集《拟古》第六首，又见《文选》）

阴，台高来积阳，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宫墙，饰巧无穷极，土木被朱光。征求倾四海，雅意犹未康。苟欲娱耳目，快心乐腹肠。我躬不悦欢，安能虑<sup>①</sup>死亡。（《艺文类聚》二十，末四句据《韵语阳秋》补入）

案钟引陶《读山海经》诗，不举其起首一句，而举其中之“欢言酌春酒”一句，必以其最合乎所谓“华靡”者也。而今存应诗，适有此“酌彼春酒”四字，两相对照，又可知钟之所以定陶潜出于应璩者，不特准乎诗体，抑且准乎其所用之文（即词藻）。盖效他人诗体者，往往即用其文，此为六朝人习例，如谢朓有“叶依黄鸟”一句，而虞炎以“黄鸟度青枝”效之者，是也。而江淹《杂诗三十首》，凡效某诗，必袭用某诗之文，尤足以证明此点。吾人姑不例举，而止列李善注此杂诗之例，略以明之。其言曰：

江之此制，非直学其体，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为之证。其无文者，乃他说。

案江淹拟体，最为神肖，后代诗话家，每称赏之。而其拟人之法乃如此。诚以体文相关，不可分离，学其体即必用其文，亦惟用其文始易肖其体，此袭用旧文，固为拟作之一大关键。江、钟时代相近，江之拟作，既用此法，则钟之以应、陶用文之同，明其渊源有自者，固为一当然之事矣。且细味上列陶潜二诗，言其音节，则情逐辞流，声随意变，从容流靡，自成天籁，是故入口讽咏，则唇吻遒会，通体条达，全无蹇吃之处。论其辞采，则两篇皆藻炳意新，挺兴流采，不质不冶，婉惬适度，是以铸景入妙，设趣如生，此又文字上之华美也。至如应璩“济济”一篇，今不可见，无以求其如陶之华靡者，然如上列“年命在桑榆”一诗，（《艺文》当有删节），亦足以见其行文流靡，文字清华，颇有类陶之处乎？

二曰真古。《诗品》评应璩云：“善为古语”。又云：“雅意深笃，得诗人刺激之旨。”而于陶潜则云：“笃意真古，辞兴婉惬”云云。吾人试对照之，知钟氏实又以“真古”二字，视为应、陶相同之点。盖应诗多循古义，始有古语，是即陶诗之所谓“古”者也。而应诗亦惟有雅意深笃，方可不逐流俗，独抒己见，心诚词切，旨含讽谕，是又同乎陶诗之所谓“真”者也。实则“真古”二者，本可不分，盖诗家不逐流俗，必存往昔，是即曰“古”，而亦惟有我之能“古”，方可挥发我之至“真”也。即就“真古”一类，先列应诗，而以陶诗之略相近者，附其下方比较之：

#### 应璩诗

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腠理早从事，安复劳鍼石。哲人睹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见宾，焦烂为上客，思愿献良规，江海倘不逆。狂言虽寡善，犹有如鸡跖。鸡跖食不已，齐王为肥泽。（《艺文类聚》二十三）

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诬。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所占于此土，是谓仁智居。文章不经国，筐篚无尺书。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如。（《文选》）

#### 陶潜诗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sup>②</sup>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本集《饮酒诗》第一首）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繾綌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轡诚可学，违己<sup>③</sup>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本集《饮酒诗》第八首）

上列“细微可不慎”及“衰荣无定在”二诗，有设辞警世，亦所以自惕者，有意在自励，亦足以讽人者；表面观之，似有不同，而实有一至同者在，即无不秉执古道，意存讽劝，以盛衰是非之理，明乎世之失真，俨然有自达达人之怀焉。至于后列应、陶二诗，则俱以问答之体，申写怀抱，述事仿佛，而归趣尤同，如

①“虑”字，原稿缺（以“○”表示），据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补。

②“更共”，原稿作“共更”。

③“己”，原稿作“已”。

应诗“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至<sup>①</sup>“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一段，以比陶诗“繾綣茅檐下，未足为高栖”至“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一段，则见其笃意真古，可矫流俗者，盖无有不同。而应诗云：“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如”，及陶诗“一世皆尚<sup>②</sup>同，愿君汨其泥”云云，尤见其依古义，发古情，极殚真旷之致，与夫讽喻之忱。然则“真古”二字，实为应、陶诗所同具之特色矣。

三曰质直。《诗品》评应璩云：“祖袭魏文”。检同书评魏文帝有云：“则新奇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今就此点，质之应诗各佚篇，知钟嵘所以称应璩祖袭魏文者，实以其同此质直之特色也。而钟嵘评陶，亦曰：“世难其质直”。是应、陶所以归为一流者，又以此故。兹再将应诗佚篇列出，而以陶诗之略类者，缀于下方，以比较之：

### 应璩诗

少壮面目泽，长老色丑羸。羸丑人所恶，拔白自洗苏。平生发完全，变化似浮屠。醉酒巾帻落，秃顶赤如壶。（《苕溪丛话》四十一《杂诗》，《艺文类聚》十八《新诗》）

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闾与郡县，希疎如马齿。生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御览》二百六十五《新论》。案“论”者，“诗”之讹字）

太官有余厨，大小无不卖。岂徒脯与糗，醢醢及盐豉。（《御览》八百二十八《新诗》）

洛水禁网罟，鱼鳖不为殖。空令自相啖，吏民不得食。（《御览》八百三十四《新诗》）

野田何纷纷，城郭何落落。埋葬嫁娶家，皆是商旅客。丧侧食不饱，酒肉纷狼籍。（《御览》五百五十六《新诗》）

丰隆赐美味，受嚼方咄咄。鹿鸣吐野华，独食有何甘。（《北堂书钞》百四十三《新诗》）

茫茫九州内，莫作帝者民。民有忠信行，莫作帝者臣。（《御览》六百二十一《百一诗》）

京师何缤纷，车马相奔起。孝廉经术通，谁能应此举。借问乃尔为，将欲要其仕。（《北堂书钞》七十九）

### 陶潜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枣与栗。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本集《责子》）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觴至辄倾杯。情欣新知劝，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本集《乞食》）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下，步止华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已。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

（本集《止酒》）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觴注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时，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

（本集《杂诗》第四首）

上举应璩各篇，或题曰《百一诗》，或题曰《新诗》，或题曰《杂诗》，实则皆《百一诗》之佚文，《杂诗》则字讹，（如“散骑常师友”一篇，《北堂书钞》、《初学记》，皆作《新诗》，而仅《艺文类聚》作《杂诗》，此必字讹无疑。）《新诗》则《百一》之简称也。（如王楙《野客丛书》二十七应璩《百一诗》条，引《七志》曰：“应璩谓之《新诗》，以百言为一篇，谓之《百一诗》。”又如“有酒如浩川，有肉如积岑”二句，《书钞》三见，或作《百一》，或作《新诗》，皆其证。）寻应璩此诗，既意在讽喻，欲使读之者惊心动魄，足收谏戒之效，故特出新题，应用俗语，俾成为最易感发之新诗。则其撰作，实不以藻采为能事，此著名千载之《百一诗》，遂多失诸质直，在应诗中，不能为最优之篇什也。顾此一诗体，亦以与当时力求词采之传统文体相乖远，而始能建立此独特之风格，钟嵘据此，探诗家之渊源流别，固又言其所应言者矣。惟此质直之体，陶潜虽尚有之，然已有其长，而无其短。陶诗较质直而可与应诗比较之各篇，在陶集中实皆较劣之诗也。夫华靡与质直异致，一人之诗，似不能兼具此相反之二端；然寻诗至宋齐，渐涉偶丽，词采浮

①原稿无“至”字，据文意补。

②“尚”，原稿作“至”。

③“丛”，原稿作“从”。

艳，文茂情晦，以此时代之人，而视应璩、陶潜之诗，固必目之为质直，目之为同一诗派矣。则钟嵘所以谓应、陶之有源流关系，实亦略从当时之论。第其评应，则必曰华靡，评陶则必曰风华清靡，则有意就流俗之论，而反言之，以明应、陶诗质直中而有华靡，盖情词并茂、文质彬彬之意也。其推奖二人，于此亦可知矣。据上所述，应、陶实有其共有之特色，钟嵘之评，固为一有见之论，而后人不加深考，而遽诋之，何哉？

复次钟嵘别流之法，常不谓一人仅出一源。故其评灵运，一则曰“源出陈思”，再则曰“杂有景阳之体”。评鲍照，则一曰“源出二张”，再则曰“总四家而擅美”。其不滞于一源一流之见，而能有所变通，实又钟嵘高明之处。而其于陶潜，亦用此法，故于源出应璩之后，继之曰：“又协左思风力”。可谓周密之至矣。今更就此点，而略为论证之。案钟评左思云：

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

则其谓陶潜“协左思风力者”，当本此意。寻真古、质直等特色，应璩固多似陶，然如借烈士贤人，以发我之激慨，用山林招隐，以畅我之高情，此又左思、陶潜所共有，而应璩若无之者。是以钟嵘别有此论，以明陶诗之渊源非一也。兹略取左、陶之诗，分列以比较之：

#### 左思诗：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左思《咏史诗》第五首）

#### 陶潜诗：

燕丹善养士，志欲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sup>①</sup>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商音更流涕，羽<sup>②</sup>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所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本集《咏荆轲》）

皆以荆轲故事，发其激越之怀，此左、陶诗风力相侔者也。而陶潜《咏三良》、《咏贫士》及《拟古》等作，亦俱与左思《咏史》诸篇，诗体相若，无论辞意，悉为仿佛。兹不一一较之。至乎高情旷志，惬心隐沦，左、陶篇什，亦正异曲而同工。

#### 左思诗：

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sup>③</sup>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亦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糗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经始东山庐，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水，可以莹心神。峭蒨青葱间，竹柏得其真。弱叶栖霜雪，飞荣流余津。爵服无常玩，好恶有屈<sup>④</sup>伸。结绶生缠<sup>⑤</sup>牵，弹冠<sup>⑥</sup>去埃尘。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招隐诗》二首）

#### 陶潜诗：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此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道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拟古》第五首）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良晨入奇怀，絜杖还西庐。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略）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内，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诗》）

此均可以较其诗体者。又如左言“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陶言“山泽久见招”、“荒途无归人”；左言

① “剑”，原稿作“京”。

② “羽”，原稿作“朋”。

③ “丘”，原稿作“立”。

④ “屈”，原稿作“曲”。

⑤ “缠”，原稿作“墨”。

⑥ “弹冠”，原稿作“冠弹”。

“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陶言“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左有“白云停阴冈，丹葩耀阳林”之句，陶之“芳菊耀林开，青松冠岩列”及“青松夹道生，白云宿檐端”似之；左有“秋菊兼餽粮，幽兰间重襟”之句，陶之“园蔬有余滋，旧穀犹储今”似之。玩其旨趣，察其文体，盖率多相仿佛者。且《诗品》评左思“文典以怨”一语，亦正可施诸陶诗。兹更选数句，比较列之。

#### 左思诗：

- 1 爵服无常玩，好恶有屈伸。
- 2 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
- 3 英雄有屯邕，由来自古昔。
- 4 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  
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谋。
- 5 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
- 6 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

#### 陶潜诗：

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  
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达。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  
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

或据古事，以申今情，此可谓“典”；或据往烈，以抒己愤，此可谓“怨”；而俱为衰世自厉，深达天道，得乎讽谕之旨者。左、陶之体其同也若此，又足见“又协左思风力”之言，信而有征矣。

吾人就其评陶一例，辩论已多。约而言之，钟嵘别流之法，可称者计有两事：一，详察甲乙文体，必确见乙之甚肖于甲，方定乙诗之源出于甲，绝非率尔为之者。二，如乙诗体备多格，不只肖甲，抑且肖丙，则权其轻重，定乙诗源出于某；又杂某体，并不拘于《七略》一源之论。前者见其精，后者见其通，评诗若此，已无愧于立言之道。吾人诚能就其所论，观其所由，不至如渔洋之轻率，厚诬古人乎？然应璩、左思之诗，今存甚鲜，其与陶诗之毕肖者，未必即如上举之各篇；龟勉为之，览者其不讥我执拘乎？又上列别流者二十五组，宜悉取较论而综合之，以见钟氏别流之真谛，兹仅举其一，庶以示例焉尔。

### （三）论诗起例

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篇》云：

诗又与奏议异状，无取数典，钟嵘所以起例，虽杜甫愧之矣。迨于宋世，小说杂传禅家方伎之言，莫不征引。夫以孙、许高言庄氏，杂以三世<sup>①</sup>之辞，犹云风骚体尽，况乎辞无友纪，弥以加厉者哉。

此称钟嵘论诗起例之善也。检叶梦得《石林诗话》云：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以此为根本，而苦思难言者，往往不悟，钟嵘论之详矣。

又严羽《沧浪诗话》上云：

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略）诗者，吟咏情性也。

皆本钟嵘吟咏情性不贵用事之旨。检钟嵘起例，并非一端，其较著者，并可以考鉴当时之诗风诗派，故不可不为之一说也。今择二<sup>②</sup>事，论之如右<sup>③</sup>：

#### 1. 主情性

《诗品》云：

夫属辞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下略）

案此说为当时文评家普遍之论。《梁书》四十三《庾肩吾传》，太子（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云：

① “三世”，原稿脱“三”字。

② “二”，应为“三”。文中所论，实有三事。

③ “右”，似应作“左”。



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

亦以吟咏情性不贵用事为言。寻简文所谓“吟咏情性”，其意盖以当时新变之宫体诗（《梁书·简文帝纪》：“伤于轻艳，号曰‘宫体’”），最足当之。其《答新渝侯和诗书》云：

垂示三首，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略）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故知吹箫入秦，方识来凤之巧，鸣瑟向赵，始睹驻云之曲：手持口诵，喜荷交并也。

新渝侯诗，今不可见，然自文中“双鬓”、“步摇”、“细腰”、“好面”等状词观之，知简文所谓“性情卓绝”者，殆如《玉台新咏》所载简文诸什，即专写闺情宫怨之宫体诗，而所谓“情灵摇荡，丽靡浮艳”者也。第简文所谓“情性”，是否同于钟嵘，于此不可不辨。考诗至刘宋大明、泰始之际，衍为二派：一则拘挛补衲之用事体，一则吟咏情性之新变体，前者以颜延、谢庄为代表，后者又以鲍照、汤惠休为代表也。请一举证明之。裴子野《雕虫论》曰：

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意。自是閭閻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揜落六艺，吟咏情性，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裴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志极风云，其兴浮，其志溺，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诗有宗途，亦有宋之风也。

此“吟咏情性”，即指鲍照、汤惠休，此观《诗品》评谢超宗等七人之论，即可灼见也。其文云：

余从祖正员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唯此诸人，传颜、陆体。

而当时相反之颜、陆体，《诗品》亦曾言之，其略云：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可证此情性、用事两派均起自大明，且自始即相水火，壁垒甚严，其代表人物，如颜延之与鲍照、汤惠休等，遂至迭相非笑，传为佳话。《诗品》评颜延之云：

汤惠休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

而《南史》三十四《颜延之传》则云：

延之尝问鲍照已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铺彩列绣，亦雕绘满眼。（案鲍、休气谊甚洽，共成一派，李白《酬裴留岫师弹琴见寄》（李集十七）云：“君同鲍明远，邀彼休上人”。又《赠僧行融》（李集十一）云：“梁有<sup>①</sup>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又《江夏送倩公归汉东诗序》云：“且能轻产重诺，好贤攻文，即惠休上人，与江、鲍往复，各一时也。”皆见鲍、休友情之深。而为后人传诵如是。案鲍集有《秋日示休上人》，及《答休上人》两诗，亦见其彼此之交好，其评颜延之雷同若是，非无故也。）

此鲍、休之嘲颜者。而《南史·颜延之传》又云：

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事。”

又《诗品》评休上人云：

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颜公忌昭之才，故立休、鲍之论。

此又颜延之攻击鲍、休者。二派相激相荡，淄渑并泛，泊乎齐、梁。承用事一派者，有任昉、王融，承情性派而又为新变者，则梁简文帝、徐摛之宫体诗是也（详《梁书·徐摛传》）。此两派之俱失偏陂，可于《梁

<sup>①</sup> “有”，原稿作“曰”。

书》四十九<sup>①</sup>《何逊传》见之，其载范云之言曰：

顷观文士，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今古，见之何生矣。

案用典用事，其失在儒，淫靡侈情，其失在俗。故钟嵘评鲍，谓“言险俗者附之，伤清雅之调”，任昉“善铨事理，拓体渊雅，亦因动辄用事，诗不得奇。”则吟咏情性，与夫用典用事者，固南朝诗论争执之核心，实治文学史者所必深切注意之事也。钟嵘主情性而反用事，自表面观之，若党于休、鲍一派，然观钟嵘之评惠休，一则曰“惠休淫靡”，再则曰“情过其才”，虽认汤诗合乎情性，亦实贬其过于淫靡，则钟嵘之所谓“情性”，与休、鲍者不同，与梁简文所主张者尤异也。寻钟氏此论，实谓吟咏当以“意”为主，而深矫当时过重词藻之弊，其主张盖于陆机《文赋》、范曄之论，前后相合。陆云“诗缘情<sup>②</sup>而绮靡”，固已以情为主矣。又《宋书》六十九《范曄传》载曄《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云：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作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绘，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寻范氏主“意”之说，所以矫用事牵累之弊（“事尽于形”，“义牵其旨”），与钟所论正同，一也；范论主“意”，总归托情见志（“情志所托”），则谓之即主“情性”，亦无可不可，二也；范之论文，兼赅众体，而不限于情性一类，故须以“意”为论文之准，钟嵘则专评诗篇，故可以“情性”二字，代主“意”之论，实则皆本古说，三也；然钟嵘情性之说，虽然袭用当时习语，与简文之言“情性”者，固不同矣。

## 2. 避用事

钟嵘论诗，既主情性，故凡有背此情性之各诗体，如玄理派、用事派、声律派等，皆一概评驳之。盖玄理与情性异致，用事伤直致之秀逸，声律多选字之拘忌，斯皆有损于诗者也。检玄理一派，至宋初已告结束，齐、梁文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等，皆仅视此派为历史上之陈迹，而略论其得失，并无若何攻击之对象，是以《诗品》于此，亦止称永嘉迄于江左，诗体“理过其辞”而已。惟用事及声律两派，则流沿于数纪，大盛于当时，其势力之大，较之玄理体之在两晋，盖有过之而无不及，故使后进倾惑，争相陵架，鲜有知其不然者。钟嵘乃能独持异见，针砭时弊，是不得不服其见解之高，及起例之善矣。案此二派，在当时一为旧格，一为新体。然此所谓“旧格”，至梁时已复变本加厉，不同于往昔，而此新体之成又有其所以如此之背景，俱须于此论之，以见钟嵘论断之如何。请先言用事一派，《诗品》云：

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sup>③</sup>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于用事一派，出此四人，以为例据；而评人则只于颜延之及任昉，以言其用事之弊。如评颜云：

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之雅才，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

又评任云：

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夫用事繁，拘束多，以至诗不得奇，此诚至当之论。然寻钟嵘虽有此论，实并不以为凡用事之诗，皆无一篇可读，而一切唾弃之。推其此意，乃针对当时文士用事风气之滥，而欲矫其流弊而已。《梁书·王僧孺传》云：

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

僧孺、仲伟同时，而以用事见称，足见颜、任影响之大，及当时用事风气之盛，与钟嵘所谓少年士子，多

<sup>①</sup>原稿作“四十四”。《何逊传》见《梁书》四十九，列传四十三。

<sup>②</sup>“缘情”，原稿作“伤情”。

<sup>③</sup>省略号原稿无，因此处省略“尔来作者，寔以成俗”一句，故加。

效任昉之语，正可互相发明。寻文章以用事相高，虽昉于魏晋，实盛于齐梁，文士至此，乃以发抒情思之工具，用以矜炫其学问经纶，固不止于“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sup>①</sup>表学问”之一端也。惟其风气如此，故当时各种“类书”，乃代有修撰，以为供应此一要求之贵重典籍。《南史·萧子良传》云：

建元五年<sup>②</sup>，正位司徒，给班剑二十人，如侍中如故，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

又同书《刘峻传》云：

峻为安成王秀撰《类苑》，梁武帝命诸学士撰《华林编略》以高之。

同书《何思澄传》，则并记其重要撰人，及书合七百卷八年乃成之事。俱见撰修是书之若何隆重。又同书《陆杲传》云：

杲弟煦子罩，初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连璧》，罩与群贤并撰，区分者数岁。大通六年<sup>③</sup>，书成，令湘东王为序，其作者有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刘劭之《皇览》焉。

又同书《陶弘景传》，称弘景撰《类苑》一百卷；《庾仲容传》，称仲容有《子书抄》三十卷；而《隋书·经籍志》，又有梁尚书右丞刘杳撰《寿光书苑》二百卷。凡此皆类书之流，为文家准备之辞典，其与魏《皇览》一书撰出之动机，盖俱无二致。且《皇览》一书，至宋、齐以降，亦代有改编，如何承天合之为五十卷，萧璟又作《皇览抄》二十卷者，皆是。是则当时“类书”之盛，与夫用事风气之相长相成，必使后进文士懽服于其影响之下矣。《南齐书·陆澄传》云：

王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其遗漏者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几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

则文士之以隶事炫学问者，又不止为文谈论，亦以此决其胜负，与魏晋清谈，盖迥乎不同矣。当时之流俗既若此，而又有颜延之等各大诗家用事之倡导，宜乎此体之风靡一时也。且钟嵘于《诗品》曾谓：

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

云云，是其亦已受此隶事风气之薰陶，而不以其他文体之用事者为非也。且其所撰《瑞室颂》，并以典丽见称，则钟嵘亦竟此时善用事义之一人，其不能一切抹杀用事者，自属当然之事。且颜延之、任昉之用事体，钟嵘实又尝称许其自有佳处。例如评颜延之云：

情喻渊深……是经纶之雅才。

评任昉云：

善铨事理，拓体渊雅。

盖诗能用事，以古喻今，往往生渊雅之致，而免鄙俗之累。钟嵘于此等长处，固未尝忽视之也。然则钟嵘之评驳用事，乃针对当时之流弊而发，其非一概抹杀诗中之用事体，实甚显然者矣。

### 3. <sup>④</sup>反声律。

《诗品》曰：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sup>⑤</sup>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沈约、谢朓扬其波<sup>⑥</sup>，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足矣。至于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

①“且”，原稿作“但”（初以毛笔写为“旦”字，继以蓝色笔在其左侧添“亻”旁）。

②“建元五年”，应为“永明五年”。“建元”共四年。

③应为“中大通六年”。

④“3”原稿作“2”。

⑤原稿脱“谢庄”二字，今补。

⑥《诗品》诸本皆作“谢朓、沈约扬其波”。

鹤膝，闾里已具。

钟氏一则曰：“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再则曰：“清浊通流，口吻调利”；知其反对者，仅为四声之论耳。又钟氏评张协云：

词彩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又评鲍照云：

然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

且证钟嵘亦甚以声律为重，尚不仅以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者为足止。而其评张融之语，则尤有须注意者。其言曰：

思光纤缓诞放，纵有乖文体，然亦捷疾丰饶，差不局促。

案“纤缓”云者，即“阐缓”之意。诗调“阐缓”，此亦当时文士论辨诗章之一大问题。《梁书·庾肩吾传》云：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略）。既殊比兴，正背《风》《骚》。

而《南齐书·文学传论》则云：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约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

又见此“阐缓”之弊，且坐仿灵运诗体而生。考南朝张氏以辞调纤缓，著名累代，张融诗体阐缓，正当与其家世习尚，不无关系。故《南史》三十二《张敷传》云：

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余响久之不绝。张氏后进，皆宗慕之，其源起自敷也。

敷从弟畅子即为张融，《南齐书》四十八《刘绘传》记张融等言谈云：

时张融、周顒，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顒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时人为之语曰：刘绘贴宅，别开一门。言在二家之中也。

足见张之文体阐缓，正承其家世习惯，而有意为之。钟嵘谓其有乖文体，此与沈约论文之见地相同。《南齐书》五十二《陆厥传》沈约《答厥书》曰：

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音之调。

可为明证。当时评驳诗体“阐缓”之论，既甚嚣尘上，而当时之故为此“阐缓”之体者，其人数之多，亦不可不言而喻。沈约等针对此弊，而别创新法，虽为积极之变革，而后生之效其体者，“襞积细微，专相凌架，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则沈氏不特未足救文弊，抑且变本加厉，转使文体日益远乎自然。所谓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之，此钟氏所以两以为非也。然钟嵘仅提出此空泛原则，并非具体<sup>①</sup>方案，以较沈约声病之论，此则空言，而彼有实法，无怪乎诗用声律，虽反对者众，而终能经唐泛宋，至今浩为洪流也。

据上所述，钟嵘反用事，反声律，皆就当时<sup>②</sup>之各诗派，衡其得失利弊，而发为中上用之论，可谓卓卓英绝矣。惟于永明声律一派，则仅能指出其非，而不能别标一说，以为准则，斯可憾也。然文章音节，变化无方，声律愈严，去天然愈远，后世平仄固定之诗律，实徒有其拘挛之患，钟嵘斯论，其有可以发人深省者乎？夫一家之说，有其精到之见，亦有发生此说之背景，若能两得其所以然之故，则于此一代之文风，殆可庶乎窥见。钦立此论，只能略见其端倪，语焉不详，且恐有误。甚希世之君子，有以正之焉。

附“南朝三派诗体表”<sup>③</sup>

①“具体”，原稿作“俱体”。

②“当时”，原稿脱“时”字。

③原表竖排，今改横排。

诗派	用事派		情性派		声律派	
诗人	应璩 傅咸	陆机	张协	张华		
诗体	辑事比类，非对不发，协物可嘉，职成拘制。 《南齐书·文学传论》 <sup>①</sup>	贵绮错 <sup>②</sup> ，尚规矩，无直致之奇。《《诗品》》	文体华净，风流调达，词采葱蒨，音韵铿锵。	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诗品》》		
			案情性一派，始于宋大明时，鲍休为代表，今姑依诗品，补二张于此。			
诗人	谢庄	颜延之	汤惠休	鲍照	谢灵运	
诗体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又谢庄气味清雅。	又颜延之其源出于陆机，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体裁绮密，情喻渊深。《《诗品》》	淫靡，情过其才 《《诗品》》； 委巷中歌谣。《《南史》》	其源出于二张，辄諛诡 <sup>③</sup> 靡曼危仄，伤清雅之调，险俗者多附之《《诗品》》；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净艳，倾眩心魄。《南齐书·文学传论》 <sup>④</sup>	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诗品》》；启心闲绎，巧绮华旷，疏慢 <sup>⑤</sup> 阐缓，酷不入情。《《南齐书·文学传论》》 案谢诗善用双声叠韵，尽其绵蛮之致，声律为诗，实自若人，沈约等特变之耳。	
诗人	檀谢等七君	任昉 王融	梁简文帝 徐摛		沈约	谢朓
诗体	并祖述颜延，又传颜陆体，得士大夫之雅致。	动辄用事，诗不得奇，善铨事理，拓体渊雅 <sup>⑥</sup> ，拘挛补衲，弥见拘束，殆同书抄。 <sup>⑦</sup> 《《诗品》》	世号“宫体”，伤于轻艳。		宪章鲍照，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	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善发诗端，末篇多蹶。 <sup>⑧</sup> 《《诗品》》

（责任编辑：石磊）

## 校勘逯钦立先生遗著《诗品考实》后记

2008年7月17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主编曹书杰先生打电话给我，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拟定在明年逯钦立先生百年冥诞之际，出一期专刊，以为纪念。因为我是逯钦立先生的研究生，让我写一篇回忆文章，并帮助校勘逯先生的一篇遗稿。这两件事我当然义不容辞。书杰很快将逯先生《诗品考实》手稿的复印件和排印稿给我拿来，我们就有关校勘事宜交换了意见。

书杰本人是古籍整理方面的专家，所著《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是第一部辑佚学专著，在国内受到好评，被教育部选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他对逯先生的人品学问颇为叹赏，曾多次与我谈起。值此逯先生百年冥诞之际，书杰倡行以专刊为纪念，是对九泉之下的逯先生的深挚告慰，也给我这个逯先生的弟子以发

①原稿作“南齐文学传论”。

②“贵绮错”前疑脱一“不”字。《诗品》陆机条：“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

③“諛诡”，原稿脱“諛”字。

④原稿作“南齐文学论”。

⑤“疏慢”，原稿“慢”作“漫”。

⑥“拓体渊雅”，原稿脱“体”字。

⑦原稿作“弥见拘殆，同书抄”。“拘”下脱“束”字。

⑧“末篇多蹶”，原稿“蹶”作“质”。

抒怀念之情的机会，对此我深为感动。

接过逯先生的手稿复印件，看到先生隽秀工整的毛笔字迹，我心难以平静，几十年前的往事泛上心头。他那慈祥而略带忧伤的面容又浮现在脑际。时光如过隙，转眼间，先生过世已经三十六年了，当时青年学子的我而今也已成为一个退休的老人。年老了，但看着先生的手迹，仍是倍感亲切。

这份《诗品考实》文稿当为逯先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撰，文中称：“钦立校辑汉魏六朝诗既竟，欲于古人诗评，有所借镜，以为后日撰作此段诗史之准备，故亟取此书校读之。”据知逯先生初步完成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校辑工作是在1947年，而此部文稿的前部分最初发表也在此年，题为《钟嵘〈诗品〉丛考》，原载1947年《现代学报》第一卷第九、十合刊。（后收入先生《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由此可知先生之《诗品考实》文稿撰于1947年，当时先生37岁，在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助理研究员。据曹书杰先生说这份手稿系由逯先生在解放前的一位朋友保存，近日转到逯先生的三子逯弘捷手中，再转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可谓历中国新旧之变，实为难得。

《诗品考实》文稿原件系逯钦立先生毛笔楷书写成，不仅可见逯先生工于书法，亦可使人联想当时逯先生治学之勤苦艰辛。文稿包括五大部分，即（一）版本叙录；（二）序文指谬；（三）成书年代考；（四）评诗体例说源；（五）评诗标准论要。据排印版统计字数约为35,000余字，是一篇体大思精的《诗品》研究的专论。先生从版本校辑入手，广泛搜集《诗品》序文、体例、评诗标准，参以相关史料论著，以严谨的考据之法，对《诗品》作了相关深入探究。其涉及材料之丰富，考证推断之缜密，论列态度之认真，令人感佩，显示了先生踏实深厚的专业功底。在当时学者对钟嵘《诗品》研究还没有认真展开，《诗品》版本歧出讹误甚多，先生则从整理版本入手，为《诗品》研究打开了新局面，当是有开创意义的贡献。

以《诗品考实》手稿与公开发表的该文前部分《钟嵘〈诗品〉丛考》对勘，可见后文改稿面貌。改后发表之稿虽然仍保有原初稿之基础框架、体例内容，但修订改易之多，令人为之动容。大到大段文字的重撰，大段引例的删节，小到字词的斟酌取舍，更有大量的考据结论的修订，涉及文字不下对应部分文字的三分之二。可见先生用力之巨，心思之细，态度之认真。见其文稿，想其为人，想其治学，足令今人感慨矣。

《诗品考实》文稿后半部分（三，论诗起例以下）约8,000余言，以前未曾发表，今得以面世，学者因之得见逯先生《诗品》研究的较为完整全面的成果，这对逯先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对《诗品》乃至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也是一件好事。

刘孝严

2008年8月6日